

1956年匈牙利事件的 经过和历史教训

〔匈〕雷尼·彼得编

人 民 出 版 社

K515.5/1

1956年匈牙利事件的 经过和历史教训

1981年匈牙利《人民自由报》的一组文章

〔匈〕雷尼·彼得编

赵平生等译

人 民 出 版 社

封面设计：倪天熙

EZ TÖRTÉNT

CIKKSOROZAT AZ 1956-OS
ELLENFORRADALOMRÓL
RÉNYI PÉTER (szerkesztő)

NÉPSZABADSÁG-KÖLSÜTH 1981

据匈牙利《人民自由报》和科苏特出版社1981年版译出

1956年匈牙利事件的经过和历史教训

1956 NIAN XIONGYALI SHIJIAN
DE JINGGUO HE LISHI JIAOXUN

1981年匈牙利《人民自由报》的一组文章

〔匈〕雷尼·彼得编

赵平生等译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六〇三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4.75印张 94,000字

1984年10月第1版 1984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9,900

书号 3001·1963 定价 0.75元

（内部发行）

出 版 说 明

1956年匈牙利事件二十五周年的时候，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机关报《人民自由报》为了重温历史、统一认识和教育青年一代，在1981年9月18日—10月25日连续发表了该报编辑、记者所写的十三篇文章，根据大量历史资料，系统地介绍了事件的前因、经过及其后果。这些文章随后汇编成册，书名为《这么回事。关于1956年反革命的一组文章》，由《人民自由报》和科苏特出版社联合出版。书的编者和前言作者雷尼·彼得是《人民自由报》副主编、党中央委员。

本书根据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决议和其他文件的精神，重申导致事件的悲剧性发展的四个基本原因是：1)居领导地位的拉科西—格罗集团犯了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的错误，“从1948年底起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基础”；2)以纳吉·伊姆雷和洛松齐·格佐为代表的党内反对派，“为反革命势力开辟了道路，从而实际上背叛了社会主义事业”；3)霍尔蒂法西斯分子和地主资产阶级企图复辟资本主义；4)国际帝国主义插手。作者强调，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把党的前领导所犯的错误看成是造成反革命事件的各种原因的第一位原因，但是对反革命事件的最后形成起决定性的主要作用的因素是国际帝国主义及与其勾结的霍尔蒂法西斯和资产阶

级流亡分子。

1956年匈牙利事件不仅是匈牙利的民族悲剧，而且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事件。二十多年来各国出版了不少研究这个事件的论著，对事件的性质、原因、人物评价和经验教训等都存在不同的看法，本书对我们了解匈牙利本国现在如何看待这些问题会有所帮助。

前言

拉丁谚语说：“如果两个人做同一件事，那也不会是同样的。”如果不是做同一件事，而只是谈论同一件事，那就更不会是一样的了。

使我们想起这句话的情况是，现在某些西方新闻机构越来越频繁地谈起二十五年前发生的匈牙利反革命尝试，而《人民自由报》以《这么回事》为题刊载一组文章，回顾了发生在1956年中期至1957年中期那一艰难年头的事件，介绍了事件前几年的情况；描述了10月底至11月初那些悲惨的日子里发生的事件，然后又描述了社会主义力量消灭武装叛乱、恢复法制、开始稳定政局的斗争。

成千上万的读者对这组文章很感兴趣。许多人问：为什么不汇编成册，使人能一起读到这组文章？现在《人民自由报》编辑部和科苏特出版社将这组文章汇编成册，联合出版了。

毫无疑问，西方资产阶级宣传机构在1956年事件问题上遭到了惨败，它们虽然从来没有对自己、对自己的社会舆论公开承认这一点，但还是默认了这一失败。1956年10月，它们进行了超过以往任何时候的煽动，发动了世界性的歇斯底里的宣传运动；几年后，它们不得不字斟句酌，以某种赞扬的声调来谈论匈牙利社会主义社会及其不可否认的成就。它们从

从来没有诚心诚意地承认这种“变调”，在定调者中，也从来没有谁站出来说：他们错了，错误估计了形势或被人引入歧途。（他们现在大概也不会来补上这一课。）

的确，讲大话的人很快就不谈什么“光荣”的斗争和“革命”了，好心肠的人也尽可能忘却这些空话。我们怎么能够这么快就站起来，又是怎样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就由“被践踏的”匈牙利人的祖国变成了许多西方人士也尊重，甚至喜欢，并以物质生活富庶、人民情绪活跃和政治空气新鲜而闻名的国家的？西方宣传机构对上面这些问题如果不得不谈论一点的话，他们就力图用卡达尔·亚诺什的某种超自然（他们用非凡这个词）的天赋来解释（当然这些自然的秉性确实也起了作用！）或者以匈牙利人的“机智”来解释，这一点，他们过去在描述我们民族的特征时从来没有谈到过。每种借口都不错，他们就是不敢承担事实上必须承担的任务：彻底审查他们有关“匈牙利问题”的虚伪的历史分析。今天，仍有许多人尽管尊重我们的国家，但他们没有勇气反对关于1956年事件的陈词滥调。

当然，那些今天仍然在“纪念”1956年的血腥恐怖日子的人属于另一类型。这些人直至今日仍把匈牙利反革命事件和白色恐怖下的杀戮当作“英勇的起义”，他们作为烈士哀悼的不是灾难的受害者和反对灾难的战士，而是罪犯。他们这样做当然是不费力的。他们还力图证明拉科西下台以来没有发生任何实质性变化，这是他们一个最主要的目的。（他们的这种立场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使他们感到难过的不是社会主义的错误，而是社会主义的斗争成果。）

那些在西方导演这类纪念典礼的人，会在多大程度上认

为现在是复活 1956 年这类事件的好时机？看来他们会大失所望——至少他们要估量一下，这样做对他们今天的政治目的是否有利；例如，他们把波兰发生的事情同匈牙利 1956 年事件相提并论，会在多大程度上有利于他们对波兰实行的策略；更不用说，如果他们不谈 1956 年以来的事态发展情况，他们所谈的 1956 年事件就不会令人信服这一点了。

在今年这个整整二十五周年之际，我们考虑的完全是另一回事。二十五年是四分之一世纪，不管时间过得多么快，这已是一个历史阶段。在这一历史分界线上，值得花些时间作一回顾，总结一下成绩。

1945 年是我国现代史上划时代的一年，这一年我们的国家解放了，苏联和反法西斯力量取得了胜利，它结束了由老爷们统治的匈牙利，为人民的匈牙利开辟了道路。这是对历史进行各种分析的基础。1956 年社会主义制度被动摇导致了民族的悲剧。杰出的革命家，维护秩序的军人，无辜的、手无寸铁的平民，同被引入歧途的青年一样，成了牺牲品。之所以说是悲剧，是因为它威胁了 1945 年给我国人民带来的自由和各种有利条件。在实行人民民主制度的年代里，在社会主义建设开始的阶段，我们民族的历史上发生了根本的转折。

一度曾引以为豪的口号是：“我们已经会运用自由”，这并不完全合乎事实。一方面由于胜利而骄傲起来的领导人专横跋扈，另一方面国际上在实现社会主义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错误的做法——导致深刻的危机。老实说，只是在付出痛苦的经验 and 惨痛的失败的代价并吸取了重大教训之后，我们才真正学会了运用自由，才能利用解放和社会主义制度所带来

的各种有利条件为人民造福；在这方面，这二十五年是有其历史意义的，因此值得并需要思索一番。

反革命事件与下面的情况是不可分割的，这些情况比任何理论上的解释都更深刻地表明了下述道路的无情逻辑——直到最极端的结局——，这条道路从宗派主义出发，通过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先“左”后右的歪曲，导致党内团结破裂和党群关系被破坏，直到反革命能公开登台，开始复辟资本主义，甚至法西斯制度。列宁说，群众有时在几天内学到的东西比别的时候在几年内学到的还要多，这用在1956年反革命事件上最贴切。在事件发生时，在最初几个月还相当混乱的情况下，还难以对此作出估价，但当局势平静一些，事情就显而易见了：不仅是党，而且群众也学到了许多东西。急风暴雨式的、无情的十三天强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简言之，上了一课。它教育我们不仅不能忘记这一切，而且我们有义务牢牢记住并把它作为教训传给在事件之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及其后代。

在周年纪念日来临之前，可以听到一种认为我们对1956年事件将缄默不语的意见，西方电台发表了一些长篇分析，说关于这方面的题材他们写了和出版了多少本书，而我们比他们少多少。统计数字是正确的，但他们想用这个数字来支持他们的论断就不那么正确了。还从来没有——在我国历史上肯定没有，大概在其他国家也非常少见——哪次政治纠葛和危机是象1956年事件后我们那样认真“研究”过的。我们承认：我们的研究不是通过历史研究文章的数量，不是通过一系列理论著作，而是通过生活本身，通过现实，通过变化了的实

践和国家、人民、党及整个社会的生活，在政治、经济、文化和思想工作的各个领域进行的。开始时——已是1956年12月初——我们完全一致地澄清了事件的性质和原因；我们在党内，并与人民讨论了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不仅进行了讨论，而且还取得一致的看法。这是局面迅速稳定的一个最重要的条件。

今天的青年有理由对过去好奇，他们之所以难于理解当时有什么偏差，是因为在他们自己的生活中根本遇不到类似的现象，或者即使偶尔遇到了，也是以缓和得多的形式出现的。这看来自相矛盾，似乎很奇怪，但事实就是如此。我们还看到，他们不理解的原因是由于我们没有适当谈论这些问题。然而，在某种意义上——而且是非常重要的意义上！——原因恰恰相反：我们维护并发展了斗争成果，注意克服过去的错误，彻底改变了需要改变的做法，以致在许多地方几乎使年轻的一代感觉不到以前是怎么样的了。一种社会制度，一项政策，它曾同历史上的痛苦经验教训有关——现在仍然用之比较，以致今天在作出任何原则决定时，不管是说还是不说，都要估量一下：这些措施是否符合当时得出而目前仍然有效的经验教训，历史的经验教训是没有什么可隐瞒的。

只有那些在今天的实践中不想正视上述经验教训的人，才会不谈丑的、令人憎恶的历史。为什么我们要无视比如说当时的强行集体化、破坏法制、机械地抄袭等错误呢？为什么我们要不谈违反社会主义民主的个人迷信呢？为什么谈论精神生活千篇一律等等对我们会是棘手的题目呢？（如果有人想让我们谈历史一样过多地谈论这些问题，我们可以不断

地提出数字说明有巨大变化，而且仍在变化之中。只不过是
我们已吸取了教训——而且是那时期的痛苦教训——，成绩
是不断取得的，过分宣传就会有害。）

我们并不只是在实践方面正视已发生的事情，提供精神
食粮的，搞创作的知识分子在这方面也作出重大贡献：很难数
清有多少作品、散文和诗歌、剧本和电影、报告文学和文章在
直接和间接地描述、探讨和分析这些题材。我们可以大胆地
说：六十年代的文艺大发展主要是与此有关：一方面是令人震
惊的生活感受，另一方面是展现出来的前景给一系列创作以
灵感，这些作品的独特之处是在寻找出路，它们说出了人们的
苦恼和怀疑，用信任回答了对它们的信任。

而且，各种事实证明，无论对 1956 年事件本身还是对事
件的前因，我们都没有“避而不谈”重要情节。现在，在我们这
些文章中所描述的事情，除少数例外，都已在文件和报道、决
议和论文，以及各种出版物中发表过，已经发表过的东西甚至
比我们在这些文章中引证和介绍的要多得多。我们的研究工
作虽然不是有系统有计划地进行，但是在进行之中；研究这一
历史阶段的史学著作虽然在数量上没有超过西方的出版物，
但在可信任的程度上和扎实性上则是远远超过的，在西方的
出版物中很少能见到可称为科学的东西。在稳定局面时期，在
最初几年，党所作出的重要决定没有一个是回顾这一阶段
的经验教训的，没有一个是当时情况进行更为深入细致
的分析的。1962 年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决
定召开全会来估价产生一些破坏法制行为的原因、后果，最终
结束我们惯用个人迷信的共同术语来表达的一切现象。

有些人说，这方面还有要补救的东西，还有许多事情要做，他们说的是正确的。既然这一切是在二十五年中零散地在各种出版物中公诸于众的，这对广大公众来说就很难弄清事情的全部。假设（这当然是不现实的）所有事件的积极参加者或受难者都看完了这些出版物，那也仍有巨大的空白：那些在1956年后变得在政治问题上感兴趣、有觉悟的几代人占当前成年居民的绝大多数。（1980年三十岁以下的人已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四十四。）还值得提一下的数字是，党员的百分之七十五点三是1956年后入党的。因此，总的说来：在这个题目上，我们既不对什么问题避而不谈，也没有要回避的东西，但是事实就是事实，我们没有以应有的方式使客观材料、实际情况成为人人看得到的材料，也没有对材料作出解释，进行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

我们也可辩解，正如前面所说，吸取这一阶段经验中得出的教训的工作把我们两只手都占了。还有一些事情我们同样不能不谈：1956年是一个要使每一个人都进行自我检查的时期，只是每个人的程度有所不同而已。最终引导我们走出危机的政策和做法也是从这些自我检查中产生的。在那一时期的一个明智决定是，相信大多数人是正直的，让人们自我检查，不期待那些犯错误的人负荆请罪。

除了要追究罪犯、煽动者、有意把人引入歧途者的责任以外，由于犯了错误就兴师问罪的做法，无论如何是没有道理的，这样做就太不令人理解并且会引起混乱。事后揭已经愈合的伤疤有什么好处呢？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没有满足日益增长的、要求介绍情况的愿望，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就是因为考虑到

上述情况：今天我们也无意揭某些有关人士的老底，我们相信，别人也不会这么做。当时认为应该根据今后的工作、活动作判断的观点是正确的，今天我们仍根据这一原则，而不是根据他们过去所持的观点来判断一个人。

如果我们重新考虑 1956 年——通过事件的前因、事件本身及其后果——给予我们大家的历史教训，就可避开这些绊脚石，从而得到很大好处。更主要的是，如果我们全面考察一下自事件以来的整个时期，更准确地研究一下下面一些问题——因为我们在这里不能研究更多的问题——，即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方针是如何根据教训修改的，我们是怎样重新找到列宁的道路，又是如何继续在这条道路上走的，政治工作和社会生活的这样一种作风和方法论是如何形成的，这种作风和方法论给我们的帮助很大，它使我们面对今天和明天的难题也能满怀信心地展望未来。

鉴于篇幅有限，我们自然只能叙述较重要的过程。我们深信，这些文章有助于唤起和充实同时代人的回忆，能使年青人更好地了解不久前经历的这一特别复杂的时期，因此我向读者推荐这些文章。如果万一有人觉得由于事情极其复杂而难以理解，那就请想想，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我们离当时的问题已很远很远，悲剧性骚乱已最终成为历史。然而，我们要更谨慎地记住这些教训。

目 录

前 言	雷尼·彼得 (1)
从骄傲自满到信任动摇	桑托·耶诺 (1)
摆脱困境的机会及机会的丧失	桑托·耶诺 (12)
修正主义分子及尾随他们而来的人	桑托·耶诺 (23)
从“自发的”示威游行到有组织的政变	萨波·拉斯洛 (34)
为什么反动势力能占上风?	萨波·拉斯洛 (44)
恐怖的日子	萨波·拉斯洛 (54)
最后的灾难	萨波·拉斯洛 (64)
11 月 4 日清晨 5 时:行动的钟声敲响了!	平泰尔·伊斯特万 (74)
为了开始工作,为了社会主义的复兴	平泰尔·伊斯特万 (84)
当新春到来时	平泰尔·伊斯特万 (94)
为摆脱困境而斗争	瓦尔纳伊·费伦茨 (105)
真正的“新春检阅”	肖约姆·约瑟夫 (116)
“我们要把目光转向未来”	韦尔泰什·伊姆雷 (125)

从骄傲自满到信任动摇

谁要列举 1956 年匈牙利反革命武装暴乱的前因，他就必须克服资料方面的许多困难。无数的党的文件、演讲、论文，一本本说明情况的书籍和大量文献都谈到了原因和事件前的情况。

在 1956 年 10 月 23 日及以后的日子里，匈牙利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会发生？当时不仅由于事情复杂而难于准确判断——一些反动派别曾利用了相当大一部分群众的可以理解的不满情绪——而且还因为国内外反动派都在叫嚷“光荣的民族革命”和“自发的起义”。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对这些涌现出来的问题如何回答是至关重要的。

11 月 4 日发生转折后不到一个月，在反革命势力还在负隅顽抗，以致挑起冲突的时候，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临时中央委员会就在 12 月 2 日、3 日、5 日举行的会议上作出了明确的、毫不含糊的、极有助于迅速稳定局面，并得到后来的科学研究工作全面证明的回答。会议的最重要的论断如下：

“事件有四个基本原因，或者说决定性因素。这些原因和因素在十月事件爆发前很久就同时存在，相辅相成，共同导致事件的悲剧性发展。”

“1. 曾对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委员会和匈牙利人民共

和国政府有决定性影响的拉科西—格罗集团,从1948年底起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基础。”

“2.前几年形成并不断扩大的党内反对派中以纳吉·伊姆雷和洛松齐·格佐为其旗帜的一翼,对十月事件的发生及其悲剧性转折起了重要作用。……他们错误地把批评带到党外,搞到街上,反动分子也参与其中。这样,这种批评……就破坏了党尚存的威望,动摇了工人阶级和匈牙利人民民主制度的阵地和基础,……鼓励了反动势力,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反革命事件的爆发。”

“3.……霍尔蒂法西斯和匈牙利资本主义—地主反革命是基本因素。……匈牙利反革命的目的是复辟资本主义—地主制度,自从1945年遭到失败以来,他们一刻也没有放弃过这一目标。”

“4.最后,国际帝国主义在匈牙利事件中起了决定性的和主要的作用。他们的目的当然不限于匈牙利问题,……帝国主义过去的目的是用帮助反革命上台的办法,在匈牙利建立一个新的战争策源地,现在的目的则已是要在欧洲这个地区建立战争策源地了。”

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把党的前领导所犯的错误看成是造成反革命事件的各种原因的第一位原因,这是具有重大原则意义的。这也反映出它铭记了列宁极其正确的警告:“没有一个阶级能够推翻我们,因为大多数无产者和贫农都拥护我们。如果我们本身不犯错误,谁也摧毁不了我们。”①

①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2卷第42页。——译者

把一切都归罪于当时非常猖獗的敌人，是容易的。而这也正是拉科西之流的做法：他们在每次失败之后不是进行自我批评，而是去寻找敌人，尽管过去他们把一切事情看得很简单并加以夸大，正是他们暗示说：“这个国家所发生的一切都由我们共产党人负责。”但是他们并不接受可以从中得出的结论。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把党及其前领导的错误看成是造成反革命事件的各种原因中的首要原因，证明新领导具有政治上和道义上的高度坚定性和原则性，同时证明新领导决心回到马列主义原则基础上，把这些原则运用于我国实际，在党的组织生活中则恢复列宁准则。

党的前领导的严重缺点和错误在导致反革命事件的各种原因中之所以占第一位，是因为尽管这些原因是“同时存在，相辅相成”的，但由于前领导所犯的错误，而使人民对处于领导地位的党、对政府的信任动摇了，使人民的支持动摇了，这就为假预言家输送了信徒，使钻入内部的敌人能采取越来越无耻的行动，使帝国主义及始终与其勾结的法西斯和资产阶级流亡分子能对事件的形成——用决议的话说——起重要的、决定性的、主要的作用。这也是符合历史和时间顺序，合乎逻辑的事实。

因此，在 1956 年 10 月 23 日，闪电划破的不是晴朗的而是急风暴雨的天空。

匈牙利的政治天空逐渐布满乌云。更加令人痛心的、更使群众失望的原因是，1945 年解放后的最初几年，事情进展顺利，党及其领导人得到大多数居民的信任。战争造成了无法估量的破坏，约百分之四十的国民财富、工业生产能力的一半